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俞平伯散文选集



12
27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俞平伯散文选集

孙玉蓉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俞平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别具特色的散文家。他的散文风神雅致，语言清涩，才思赡美，词意曲折，具有旷远深邃之美。所选六十篇作品展示了作家各个时期的艺术风貌。

俞平伯散文选集

孙玉蓉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8 3/4 插页2 字数178,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19001—44000

ISBN 7-5306-0481-3/I·408 定价：4.10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编 辑 例 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孙玉蓉 (1)
《冬夜》自序	(23)
《忆》自序	(27)
东游杂志	(28)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3)
陶然亭的雪	(50)
重刊《浮生六记》序	(57)
湖楼小撷	(60)
与白采书	(71)
风化的伤痕等于零	(75)
芝田留梦记	(82)
怪异的印象	(88)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91)
《吴歌甲集》序	(97)
梦游	(99)
城站	(101)
清河坊	(105)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110)
重印《人间词话》序	(112)
春来	(113)
眠月	(114)
雪晚归船	(120)
月下老人祠下	(122)
山阴五日记游	(126)
《燕知草》自序	(131)
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133)
出卖信纸	(135)
冬晚的别	(138)
打橘子	(142)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148)
性(女)与不净	(154)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156)
《近代散文钞》跋	(165)
“标语”	(169)
阳台山大觉寺	(177)
中年	(182)
贡献给今日的青年	(186)
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188)
演连珠	(189)
赋得早春	(194)
春在堂日记记概	(197)
进城	(199)
秋荔亭记	(201)

古槐梦遇	(204)
这鬼!	(209)
一日记所见	(211)
秋荔亭随笔	(213)
罢课休课停课	(215)
无题	(217)
独语	(224)
读书的意义	(231)
谈睡	(234)
诤友	(238)
回顾与前瞻	244)
漫谈百家争鸣	(247)
哀念郑振铎同志	(250)
五四忆往	
——谈《诗》杂志	(254)
《书带集》序	(259)
荒芜《纸壁斋集》评识	(261)
旧时月色	(263)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269)

序　　言

孙玉蓉

俞平伯是“五四”以来的著名诗人、散文家、红学家，也是研究古典诗词曲的专家。1900年出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取名铭衡，字平伯，乳名僧宝，以字行。他出身于旧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高祖父俞鸿渐是清朝举人，诗人，著有《印雪轩诗钞》。曾祖父俞樾是清代的经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五百余卷。他的童年就是跟着曾祖父在苏州度过的。父亲俞陛云是晚清探花，官翰林院编修，能诗文，著有《绚华室诗忆》、《蜀辅导诗记》、《小竹里馆吟草》、《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等。母亲许之仙是杭州名门之女，也工诗文。

俞平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古文化的熏陶，奠定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辛亥革命以后，他开始接受新学教育，曾到上海学习英文和算学。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部，并举家迁居北京，与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睦邻。

1920年初，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俞平伯与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因经费不足，数月即归。尔后，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22年夏，他赴美国考察教育，在纽约仅住一个月，即因病回国。翌年，他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1924年，他又回到北京，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建国后，他任北京大学教授，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

俞平伯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作为散文家，有散文集《剑鞘》（与叶圣陶合集）、《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行世；做为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有诗集《冬夜》、《西还》、《忆》以及与朱自清等八人的新诗合集《雪朝》；做为红学家，他的论著有七十余万字，包括他早年的《红楼梦辨》和后来改版的《红楼梦研究》，均收在《俞平伯论〈红楼梦〉》中；做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先后出版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他的五十余万字的《论诗词曲杂著》，则是集大成者。他还出版了《古槐书屋词》和《俞平伯旧体诗钞》等。

二

俞平伯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曾经历一个曲折发展的心路历程。在蓬勃昂扬的“五四”时期，俞平

伯有过一段“浮躁凌厉”、思想激进的光辉历史。

1918年初，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凭着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热情，开始试作白话诗。随后，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筹备工作，并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1919年4月，他加入了“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为民众的觉醒奔走呼号。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刚好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憧憬着光明，向往着民主，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之中。1921年初，他以自己新文学创作的实绩，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并成为骨干成员。1922年1月，他和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创办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刊新诗的《诗》月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提出诗是平民的，而且应该回到平民的主张。

1922年7月，他赴美国考察教育时，在海行船上思考救治中国的方法，他认为政治、工商业人才是中国的中坚，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现在最要紧的是联合（人才集中），更要紧的，是有主义的联合，不是私人的联合。”他说：“我们不当忠于一个人，应当忠于一个主义。近来国内发生新的政治运动，我很欣喜，希望他们能真实地做出一点事，不要随波逐流，蹈前车底覆辙，反为他人造机会。”（《东游杂志》）真诚地寄希望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辨》问世。这是一本以考证为主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对《红楼梦》的研究是有开拓性意义和卓越贡献的。由于红学资料的欠缺，

书中个别观点的不成熟和论证的不全面也是难免的。然而他没有居功，却是严以自责。当他发现了一些错误后，即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和《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等文章，提出首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观点。他检讨自己在书中“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希望“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他敢于坚持正确的观点，也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这种治学态度，贯穿他学术研究的始终。

但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俞平伯的思想一度陷入消沉和混乱之中，创作也日益脱离现实。他写了《雪耻与御侮》一文，认为“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年来国耻大于外辱，所以，主张必先自强，然后能御侮。文章发表后，郑振铎曾代表叶圣陶、沈雁冰、王伯祥等人，连续写文，给予批评。对此，俞平伯并不讳言。1928年，他仍将《雪耻与御侮》收入《杂拌儿》文集，意在“存此以见吾拙”。三十年后，他在《哀念郑振铎同志》和《忆振铎兄》中，均忆及此事，并肯定郑振铎所主张的“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是对的，说“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

尽管如此，俞平伯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写信给胡适，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

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

1932年元旦，他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献词中，告诫青年们要自信，要有救国之心，要手造救国的因缘，“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表现出一个“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的知识分子的气节。

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后，他写信给叶圣陶，谈对战争的看法，认为“政府既不守三省于前，又不战淞沪于后，其意无非欲和平。”财阀营私，“军阀拥兵，而洋奴媚外，此三者苟合以误国，不和焉可得哉！”政府既然“忍辱苟合”，“淞沪之牺牲未免冤之又冤”。“弟虽现不居闸北，得幸免于无代价之牺牲，然如此苟全，亦何聊赖。”观点极其鲜明。

抗战期间，他因照顾年迈的双亲，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在北平沦陷区，日伪办的北京大学多次邀请他去任教，他都断然拒绝，宁肯过着清苦的生活。四十年代初，他曾作咏荷律句：“野塘十顷几荷田，一水含清出玉泉。菱蒂无端牵昨梦，萍根难值况今年。红妆飘粉谁怜藕，翠袖分珠不是圆。莫怯荒园归去早，西山娟碧晚来鲜。”其中“一水含清出玉泉”，“西山娟碧晚来鲜”，都是双关语，他借此表明索居荒城、一片清白的心迹。对于周作人的附逆，他感到可惜，也为自己与周作人“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而深自愧咎。

抗战胜利后，经许德珩介绍，他加入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九三学社；他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他和同仁们先后发

表了《保障人权宣言》、《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和《告学生与政府书》等，支持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1948年，他和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轰炸开封古城，严正斥责国民党大打内战的罪行。同年7月，他在关于《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上，谈道：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1949年1月，北平围城期间，他与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人发表了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八项主张。同年7月1日，他冒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集会，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佩服不已，对“群众的庄严的秩序和那高度的觉醒”深为震惊，情不自禁地作了充满激情的六十一行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抒发自己的欣喜之情，并在7月10日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八天的会上，朗诵了这首诗。他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喜悦和虔诚的心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9年，他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五四忆往》中，谈到四十年前，自己还坚信古人之言：“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却想不到‘河清’真被咱们等着了。”欣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作为一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他对新中国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的。他没有想到建国仅仅五年，他

就因为《红楼梦》研究观点上的分歧，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十年动乱中吃尽了苦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整顿提高，国家建设走上了正轨，人民在充满希望中前进。八十岁的俞平伯有感于此，又作了《近闻书感》诗：“襟怀奋发感人，言路宏开才路新，整顿提高三载绩，同看前景是青春。”在他的心中，对祖国的未来始终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他就是这样“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真诚地追求着进步与光明。

三

俞平伯的散文创作经历了由繁缛到素朴的发展过程。他有描写的才力，二十年代，他用漂亮缜密的写法，创作了不少十分精彩的抒情散文，如融情景于一气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湖楼小撷》、《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撷取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正是这些散文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湖楼小撷》堪称景物描写的佳作，充满了诗情画意，充分体现了俞平伯散文繁缛雅致的特色。其中第二则《绛桃花下的轻阴》中，作者写道：“正在春阴里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你们自珍重，你们自爱惜！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这既是寓情于景的描写，又是含有哲理的告诫。他在《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中，描写桃花，“山桃妖娆，杏花娇怯，海棠柔媚，樱花韶秀，千叶桃秾丽，这些

深深浅浅都是红的，千叶桃独近于绛。来时船过断桥，已见宝石山腰，万紫千红映以一绿；再近，则见云锦的花萼簇拥出一座玲珑纤巧的楼阁。及循苔侵的石磴宛宛而登，露台对坐，更伫立徘徊于碧桃树下，漫天匝地，堆绮翦琼，委地盈枝，上下一赤。其时天色微阴，于乳色的面纱里饱看搽浓脂抹艳粉的春天姑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由远及近，由浑然到清晰，一步步逼近，有色有光有声有动，描绘得维妙维肖。光是花的红色，就有“深深浅浅”的红，“近于绛”的红，“万紫千红映以一绿”的红和“上下一赤”的红，颜色上的差别依稀可见，而更可见的是他在描景中所含的情。他描写枫叶，“冷峭的西风，把透明如红宝石，三尖形的大叶子响得萧萧瑟瑟，也就是响得希里而花拉。一抹的斜日，半明半昧地躺在丹枫身上，真真寂寞杀人。”仅三言两语，就把听觉、视觉、感觉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他所表现的外界景物与感觉心象，匀融无间。其辞若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他的作品言情写景能够沁人心脾，豁人耳目，皆源于丰富、充实的生活底蕴，皆“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所以苏雪林以为他的散文具有注意细致绵密的描写的特点。和他的议论文相比，他的抒情散文是不很多的，但影响却远远超出议论文。

几年后，作者对繁缛的描写感到厌倦，开始追求自然素朴的趣味。注重于“传神”，讲究“略尽笔墨而神情毕肖”，追求一种“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的简洁风格。这是他的散文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他说：“刻画大苦，抒写甚乐，舍乐而就苦”，岂不自讨苦吃。他在《城

站》、《清河坊》、《出卖信纸》一类散文里，记叙在杭州时琐屑的日常生活，抒写自己对往事的依恋，对亲人的情爱，写得如行云流水，自然平淡。这种艺术境界，没有渊博的学识，自身的人格修养和笔底的功力，是很难达到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种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他在《清河坊》中声明道：“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燕知草》的后半部分作品，就愈益接近那种“韶秀以外竟似无物”的境界。《城站》写的是作者由上海北站乘夜快车回杭州探家的情形。杭州城站，在作者看来，似乎处处比上海北站好得多，他说：“其实西子湖的妩媚，城站原也未必有分。只因为我省得已到家了，这不同岂非当然。”一种“不怨桥长，行近伊家土亦香”的欣然感，使他所见到的一切都蒙上了情感的色彩。清河坊巷本是杭州一条典型的逼窄的铺石板而不修马路的长街，在作者眼中也是那么可爱，因为它曾留下作者一家“多少的踪迹”。正是“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这里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对杭州的街市感到亲切，是因为有比街市更亲切的人在。他说：“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

圆缺，又何为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清河坊》）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作者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与人间趣味的关系。这段哲理性的表述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起了很好的导读作用。

俞平伯散文重趣味，崇自然，尚简洁风格的形成，与他多方面地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营养是很有关系的。他更多地继承了明清名士派散文的艺术风格。他推崇沈复的《浮生六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种评价从某方面来说，也代表了俞平伯散文艺术的追求。以他《燕知草》中的作品而论，颇有一点晚明作家的余绪。晚明作家张岱、王思任一派作品的特征是力矫做作，独抒性灵。俞平伯的创作主张刚好与之暗合。由于性情行径的相似，特别是思想方法和艺术爱好的相通，使他的作品随处可见晚明作家的影子。周作人对此推崇备至，称俞平伯“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认为《燕知草》“是最有文学意味的”新散文的代表作。他在《〈燕知草〉跋》中，为这一派新散文下了定义，并指出俞平伯近似明朝人之处在于，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